

感念师恩，为我们启迪智慧点亮生命



▲袁锡圭(左)与刘钊合影。



▼肖英杰(左)迎接从北极返航的白响恩。



▲王伟娟(左)和吴钟铭合影。



▼何金娣(右)与丁华英合影。(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张继

世上没有神仙却有神仙般的先生

讲述人：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成员)

每个人的人生中遇到的老师，都会给自己带来影响。我读硕士、博士时的导师姚孝遂先生、林法先生，我工作后跟随的袁锡圭先生，他们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袁先生。世界上没有神仙，但是袁先生从学术到人品道德都可以说是神仙一般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们整个团队，在我们中心18位老中青组成的团队中，袁先生可以说是学术核心和精神领袖。

看似“不近情理”背后的温暖

之所以说袁先生是神仙一样的老师，是因为袁先生做人的底线很高。他平时常说，人不行，肯定做不了一流的学问。平常我们团队的人都知道，有任何请托的事情都不要去找袁先生，因为一定会被他拒绝，甚至会被批评。

袁先生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不近人情”。过去他亲自带学生，学生每次去他家，即便大冬天等在门口都会紧张得汗流浹背，甚至两腿筛糠一样地抖，因为如果被袁先生发现书读得不好，他会怒气冲冲，甚至有“你这样是读不下去的，你退学吧”这种让学生很恐惧的训诫。话虽这样说，但是袁先生的学生如今回忆起来，却都认为正是袁先生的严格让自己养成了凡事不敷衍的习惯。这应该就是袁先生对学生的另一种爱。

“不近人情”的另一面，更是对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关爱。上世纪70年代末，我读本科时就从报纸上读到了袁先生的事迹。读研究生时我对古文字考释经常产生自己的一些思考，就给素未谋面的袁先生写信，袁先生回信告诉我他的看法，并提示他自己的研究结果。后来我就常常写信给袁先生，偶尔还帮他复印一些我自己找不到的文章，袁先生每次都很及时地把文章复印了寄给我。现在我都觉得很难想象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袁先生会对我这样一个小小的研究生“有求必应”，而后来我跟随在袁先生身边工作时，更是体会到了袁先生对年轻人发自内心的关爱。

曾经在网络上引起关注的蔡伟，是锦州的一个三轮车夫，因为对古文献的热爱，一直自己钻研。有一次他写信给袁先生，解释清楚了一个学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袁先生对他赞不绝口。于是，在我们整理马王堆帛书时，袁先生就让我把他叫来一起参与工作。整理工作结束时，袁先生多次向我嘱咐：“我观察过了，蔡伟是个读书种子，应该给他提供一个读书的机会。”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经过教育部批准，蔡伟破格成了袁先生的博士，并顺利毕业，从此走上了专业的研究道路。

超脱来源于对做学问的专注

之所以说袁先生是神仙一样的老师，更是因为袁先生对于做学问的纯粹，使得他超脱于世俗之外。

袁先生做学问有着超乎常人的认真，我们不管谁拿文章给袁先生看，都必须非常小心仔细，因为一旦有错，不管是谁，都会被指责。有时即使我们只是念错了一个字，哪怕音调不对，袁先生听到都会纠正，有时还会专门打电话来指出。我们中心的很多人都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在袁先生看来，研究文字的人连字都读错是不应该的。而我们只要是把带字的纸给他看，他都会反复仔细阅读。曾经有一位同事要调离我们中心，我按照常规流程向人事处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原因。上交前，我带去让袁先生最后过目，没想到，这样一份报告，袁先生带着我改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里面的每一个字、词、语气都改到最合适。不熟悉袁先生的人会觉得他要求太苛刻，难以接受，但我们都可以为常。因为袁先生对自己更严格。

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有时候文章发表后，会发现观点跟别人重了。一些人的处理方法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表明一下，但是袁先生一定会马上表态，一定会道歉，表示这是不应有的疏忽。如果还没刊印，就在文章后加上补白、附记。如果文章已经刊印了，在重新收录文集时会专门说明。袁先生对于自己的错误也从来不自护。2018年，他曾在我们中心网站上发文章，表明自己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有错，并且表示当时论文写作时因为可比较的资料较少，文中恐还有很多错误，所以特地把纠正的文章发表在中心网站上，请大家多批评，以便改正。在他看来，一位文过饰非的教授，绝对不是真学者。

研究古文字是往过去跑，跑得越远越好，袁先生的甚至执着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太过执念于传统的道德观念，甚至太迂腐。但是对我们来说，学术生命的延续与人的生命传承是一样的，正是袁先生这样的道德人品和学术精神才是我们传承下去的最大财富。

(本报记者 姜澎整理)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而教师正是在我们最需要陪伴和引导的那个阶段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关键人物。好的教师会不经意间点燃学生的心灵，照亮学生的一生。

今年9月10日是第39个教师节。中国教师的脚步一直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紧紧相随，他们坚守“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将为人治学的精神、对育

编者按

人传统的坚守一代代传承下去。日前，获评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负责人刘钊教授，中国首位穿越北冰洋的女航海驾驶员、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白响恩，坚守特教岗位27年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卢湾辅读实验学校教师丁华英，上海市真北中学副校长、普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吴钟铭接受记者采访，畅谈生命中对他们影响至深的那些谆谆师者。

好老师就是让学生希望成为另一个他

讲述人：白响恩(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副教授、船长，中国首位穿越北冰洋的女航海驾驶员)

航海人在迷失方向时，看到灯塔，就能重新找到光再出发。我从2002年考入当时的上海海运学院，即今天的上海海事大学本科，到读完博士再到圆梦女船长的路上，导师肖英杰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引路人，更是一座人生的灯塔。

北冰洋上，导师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度过艰难时刻

人都有惰性，很容易在自我安慰中放弃对梦想的追求，而导师，常常是那一刻让我重新找到动力的人。当年驾驶“雪龙”号穿越北冰洋期间，我正承担着双重压力：驾船工作之余，我还在读博士，要完成学位论文。由于海上没有网络信号，想查阅和收集最新的研究文献很困难，因此，我的论文写作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想同时做好几件事，真的太难了。完成90多天的航程回到陆上后，我当时已留校工作，还要给学生上课，教学的压力也很大。又逼近博士学位申请的最高年限，我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肖老师却告诉我，放弃其实很容易，但坚持下去，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理想。“咬咬牙挺过去！既然你那么喜欢航海，就不仅要完成当船长的梦想、追求驾驶技术，更要在学术上坚持钻研。因为学术的深度，将直接影响你未来发展的高度。”

其实，如果当时他跟我说，算了，反正已经留校工作，硕士学历也可以，我可能就荒废了学业。正是在他的教导和帮

助下，我度过了人生最迷茫的时刻。那段时间，我午夜时分才睡觉，为了完成学术论文，每天下班后基本都继续留在办公室啃“硬骨头”。

有时人生就是这样，需要逼自己再坚持一下，需要导师给你勇气、坚定前进的方向。这些年，我一直坚持航海科研，还主持编写了《北极(西北航道)航行指南》等专业书籍。因为我常想，不能辜负老师的期许和自己的努力。

老船长倾囊相授，教我该怎么当好一名船长

肖老师也曾是一名蜚声业内的老船长，作为过来人，他一直大力支持我的梦想，教我该怎么当好一名船长。

他倾囊相授自己的航海经验：船长永远不是一个人开，船上每一位水手、机工、船员的岗位都很重要。在船上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协作。人们常说短板原理，但是他告诉我，长板也很重要。船长就得善于发现每个人的优点，才能让船开得更加平稳。

在肖老师的影响下，我努力做好整个团队的纽带，协调各个岗位的工作，调和不同部门和船员之间的矛盾。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船毁人亡。所以一个团队缺谁都不行，唯有同舟共济，才能航行得更安全。

去年，我终于取得了船长证，成为中国新一代女船长。如今，肖老师曾行驶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航线，我都去过

了；他未曾去过的南极、北极，我也陆续涉足并创造历史。驶向更远的地方、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肖老师多年来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

从师生到同事，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成为他

我曾问过肖老师，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学生是不是感觉挺骄傲？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躺赢”，其实没做什么。实际上，他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全身心地栽培。他也在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身体力行地影响着我。

相信特殊的孩子同样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在特殊学校，上课时老师要管好学生，下课时老师也不能放松。因为课间10分钟，在普通学生看来可能过得很快，但对特殊孩子来说，他们不会玩，就感觉很慢。当时师父就教我，先了解每个孩子喜欢玩什么，然后在课间有针对性投放一些玩的材料并教他们玩，一旦他们会自己玩或者和同伴一起玩，那老师的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我希望，把认真、坚持的航海精神传递下去，引导和帮助那些热爱大海的年轻人实现航海梦想。我也希望更多新时代青年走向深蓝，鼓起为人类探索未知的勇气。正如当年我的老师一样。

(本报记者 储舒婷整理)

学生每一次进步也是老师成长的契机

讲述人：吴钟铭(正高级教师、上海市真北中学副校长、普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

今年是我站上三尺讲台的第30个年头，是我的“师父”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伟娟从教的第40年。我因机缘巧合跟随王伟娟老师学习已有十七八年。每次被人问及，你从王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我想，影响我最深的便是，不忽略每个学生身上的亮点和长处，让一名学生的成长成为所有学生成长的契机，这也是老师自己成长的契机。

用包容鼓励青年教师持续叩问专业

我的教学生涯中，1999年至至关重要。这一年，我第一次参加普陀区中青年教师教学评比，而王伟娟老师碰巧是这场比赛的评委之一。

那时，我担任一所信息化特色学校的语文教师，带教一个电脑实验班。于是我思考着，能不能在作文中引入网络教学，引导学生利用局域网技术在网络上互相评改作文。这在教学还停留在课件制作的当时，多少有点“超前”“出圈”了，也让我这“青椒”心里没有底。

幸运的是，评委们没有因为我所谓时髦的教学设计，就一棒封杀了一位年轻人在教学设计上的探索。记得当时王伟娟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网络作文批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还有哪些方面是纸质作文批改无法替代的？”这让我静下心来反思，如何结合两种作文批改方式的优点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为此，我

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王老师之问。她温暖的提问，成了我对专业持续“叩问”的动力。

当若干年后，王老师在我的专著序言里写到：“那次答辩，我记住了一个大胆引入‘网络作文教学概念’的年轻教师”时，我由衷地感到幸运，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候，遇上了开放、包容的王老师。

教师不能高高在上，要俯下身子的朋友

面对学生时，老师常常会不自觉地展示“高高在上”的威严。体现在教学上，包括我在内的不少老师，常常琢磨如何通过设计“高大上”的问题，让学生理解文章的意义。

这样的“端着”的教学方式，在讲述肖复兴的艺术散文《莫扎特的单簧管，巴赫的双簧管》时“失灵”了。文中大量的比喻，让我不知如何引导学生从修辞手法中体会到作者的深意，感受音乐之美。这天放学，我直接跑到曹杨二中找到刚刚下课的王老师，她仔细思考了几分钟告诉我：“老师要俯下身，感受学生的心理和想法，把学生当作朋友，谈谈自己的感受。”

这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原来课堂教学的方式千变万化，教学的探索不是在形式上，教学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至今，我每每回顾这一次的谈话，都会有新的感悟。

(本报记者 张鹏整理)

王老师讲写作，实在是有些“安静”。她从不主张追求那些热点、潮流话题和写法，也从不好标榜什么宗旨、理念，她只是默默地做好教学的事，把每一节课都当成公开课来完成。跟随王老师学习时，这种“静水流深”的教育氛围让我不断成长。

用心点拨教会青年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

常听王老师说起和学生交往的故事。王老师在教学中不断与学生共同成长的经历让我很是羡慕。这也让我一直苦苦思索，到底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王老师看似不经意的点拨让我醍醐灌顶。

王老师有一个公众号，一次我推荐了一篇自己学生的文章，刊发在王老师的公众号上。没想到，学生作文发表了，王伟娟老师却给我发来了点评：“做老师，手头得有几张‘王牌’，这是非常宝贵而有效的教学资源，因为同伴的影响或激励往往比‘外借’的资源要管用得多。阅读教学或写作教学莫不如此。而对待‘王牌’，不能今日用、明日弃，一旦发现，你对他(她)的关注应该是持续的、多角度的、全方位的。看上去‘打造’的是这几个，其实作用的是全体。相信‘这一个’在‘这一群’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每位老师的手中，都有这样的“王牌”，这是全体学生成长的契机，也是老师成长的契机！

(本报记者 张鹏整理)

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老校长何金娣的生日。每到这一天，我们都格外怀念她。记得18岁时，我来到卢湾辅读学校，跟着校长何金娣以及副校长徐琳一起，在特殊教育的世界“摸爬滚打”。这些年，我始终不忘何校长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作为特教老师，或许我们感受不到桃李满天下的自豪，但只要能看见每一个生命发生改变，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她和徐琳老师都是我职业路上的领路人。

误打误撞进“特教班”，让我拥有“天使的职业”

1994年，以培养幼儿园教师为主的上海市南林师范学校第一次开设了“特教班”，我也误打误撞成了“特教班”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我完全不了解特教的含义，记得开学第一课，老师在黑板上用力写下5个大字“天使的职业”，这让懵懂的我有了一丝陌生的责任感——“你们要给智障少儿播撒睿智的种子”。

我当班主任带的第一个一年级班，一共有10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重度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学生。他们有的喜欢尖叫、有的动不动就要往外逃、还有喜欢的打自己……虽然10个学生里有3个“自带”阿姨全程陪读，我还是经常被各种慌乱的场面急到崩溃。

那时，我的师父徐琳几乎每天都会来帮我一起管理班级。她建议我在教室里架设摄像机，把每天的上课情况记录下来，再仔细回看，为每个学生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我们录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课，并利用休息时间反复观看，一点点从中找出头绪。

比如那个爱尖叫的学生，我们通过视频观察到，如果边上有其他学生在叫，那他也会很难受。我们就试着在他尖叫时，举起摄像机对着他拍，再放给他看，结果一看他就不叫了。后来只要我做出举摄像机的动作，他就不会再尖叫了。

在特殊学校，上课时老师要管好学生，下课时老师也不能放松。因为课间10分钟，在普通学生看来可能过得很快，但对特殊孩子来说，他们不会玩，就感觉很慢。当时师父就教我，先了解每个孩子喜欢玩什么，然后在课间有针对性投放一些玩的材料并教他们玩，一旦他们会自己玩或者和同伴一起玩，那老师的压力也就没那么大了。

相信特殊的孩子同样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要带好这些中、重度智力障碍儿童最合适的学校教育，光靠老师的爱心、耐心和细心还远远不够。最初给这些孩子上课时，因为缺乏系统性的课程，大家往往是人手一张自己的备课纸。

在老校长何金娣带领下，我们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开展“中度以上弱智儿童生存教育课程与教学”课题研究，其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孩子的大脑机能，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最大的发展、补偿和康复，并使他们具备自立于社会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

语文课上教说话、写字，数学课上带孩子认识人民币，生活课上告诉他们怎样系鞋带……我们从无到有，围绕生存教育先后开展了4项重大课题研究，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实用语文》《实用数学》《生活》《美术》4套校本资源，其中的60册被全国近300所辅读学校使用，发行量超30万册……2016年，我又跟师父徐琳参与到部编教材的研讨和编撰之中，为构建更科学的特殊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这几年，我们开始研究分层教学，按照学生程度，生活语文和生活数学课进行走班教学。起初，很多家长不理解，孩子都已经到特殊学校了，怎么还要分层？事实上，正因为孩子们的障碍程度不同，所以分层才更必要。没分层前，课堂里那些程度严重的孩子，一节课里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有效学习。但分了ABC三个层次之后，孩子的有效学习时间就会大大延长。很多家长也明显感受到分班学习带给孩子们的变化——如果没有走班，或许他们就是课堂里被放弃的对象，但走班之后，他们成了课堂里的主角，也学到不少东西。

2016年，老校长何金娣因病去世了。2019年，我师父徐琳也退休了。她们对特教事业的奉献精神，早已不知不觉浸润了我的教学生涯。今年，是我在特教这条路上坚守的第27年，如今已经带到高年级的C班(程度最严重)，我始终愿意尽全力去挑战这些在外人看来“高难度”，因为我相信，对这些孩子来说，同样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当我们每天都有进步，并且经过我们十多年的持续努力后最终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融入社会，这就是我们特殊教育老师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

(本报记者 王星整理)

我会永远热爱这份『天使的职业』

讲述人：丁华英(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卢湾辅读实验学校教科室主任)